

和解

当父亲告诉我,他不能再吸烟了。我安静地听着他说话。

现在,无论父亲说什么,我都愿意听。能够安静地听父亲说话,在我是一种喜悦。但是,曾经,我和父亲之间的对话十分艰难。父子之间也可以有怨恨,这一点应该确凿无疑。父亲对我的设计是,希望我能当干部,成为一名官员。

身为农民,父亲当初敬重的官员是村长和村支书。在父亲看来,我有机会也有可能成为干部。可能我这一生对父亲最大的不孝,便是没能满足他的愿望,让他梦想成空。

父亲对作家非常不屑。

根源在于同村里一个酷爱写作的民办教师,那人后来十分潦倒,只能平日里帮人写匿名信或申诉材料。快到春节了,挨家挨户给同村人写春联,才能混口饭吃。而且他居然一生都没正经娶过女人。

我和父亲的分歧很早就势同水火。他一直在苦心孤诣地设计我,让我怎么做,达到什么效果,再怎么做。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在我18岁时就已经开始了。比如那时候我还在当学生,他就在不断地督促我,让我要求进步。

随后,每次见到父亲,他都会训斥我。他无比激动,抖着双手,历数我失去的所有机遇,直说得痛心疾首。

我虽不回嘴,也不吵架,但我内心的执拗丝毫也不弱于父亲。不管父亲怎么说,我依然我行我素。

就怕那一天

□周振华

一个叫墨菲的外国人有个定律,大致的意思是“怕什么,就会来什么”。我就怕母亲的那一天,可那一天还是来了。

母亲走时79岁,我不满意这个数字,为什么不是89、99呢?

死对谁都一视同仁。但一旦轮到了自己的亲人,就不那么轻松了,撕心裂肺,地动山摇。母亲在时,明明知道许愿不管用,祈祷也没用,可还是执著地做,常常忍不住地在没人的时候跪下磕上几个头。

怕母亲的那一天,那个“怕”字是一年年递增的,是加速度的,是势不可挡的。每过一年,那担心都在急剧增加,并用那颗焦灼的心拼命地想阻挠什么,虽无济于事。母亲离开时的样子,和她生前睡熟了的时候一样。人老了,躺在那里的姿势,是很接近那种不好的姿势的,年龄越大,越像,这种判断,连小孩子都具备。好在躺在炕上的母亲尚有不够强劲的脉搏和呼吸,以鉴别、区分着与睡觉不同的那种不好的姿势。有很多年母亲睡熟了的时候,我总是躺在她身边瞪大眼睛端详她,深情地、默默地、专致地、仔细地、久久地……

每年冬天,老家的炕头都被母亲用树叶烧得非常热,我回到以母亲为中心的家,躺在热炕上和她聊着我们共同走过的时光岁月,听着窗外熟悉的瑟瑟风声,勾起很多温暖的回忆。我的身体和母亲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看着母亲的样子,不知是可怜,还是心疼,想着想着,就不往好地方想了。这时我会用一支胳膊紧紧地抱着母亲。只要母亲在,这个家就不一样。我躺在母亲的身旁,这绝不是小时候的依偎,而是以我认为最有效的方式传递着儿子对母亲的一种莫大的责任和极致的关心。我从来没有向母亲表达过爱,用嘴,用语言,母亲至死我也没有。

只要我在母亲身旁的时候,她一定入睡很快,睡得很香甜。反倒是我时常失眠,想母亲是怎样拉扯我们几个孩子的,想母亲曾挎着“富农分子”的牌子忍着老胃病的疼痛扫街的情景,想母亲为我们熬夜缝衣做鞋的每一个晚上。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的双手下意识地抢过母亲那除了皮就是骨头的手,频繁地倒替着使劲揉搓着她的手心手背和她的手指,我知道,这不是母亲的需要,而是我的需要,我想拽住母亲,不让她再继续衰老,我想表达对母亲的爱,永远攥着母亲的手揉搓着,我舍不得母亲,她要是走了,谁还在老家等我说话呀。我常用手指为母亲梳头,用手掌为母亲拍腰、捶背,每次也许10分钟,也许半个小时,也许一个小时,有时我实在睁不开眼了,才放手和母亲一起入睡。

我常日不转睛地长时间地端详着母亲。有时看着看着,就觉得她的睡姿怎么那么难看呀,特别是身体一动不动无法感觉她的呼吸的时候,我的心就会一下绷紧,心跳急速加快,赶紧摸摸母亲的手,用脸贴贴母亲的脸,还好,细看她的身体还在微弱地起伏着,她的脸和手还是热乎的,她偶尔还发出一两声不大的鼾声,如果眼前的母亲她身上的所有动静一旦平息下来,这不就是天塌了吗……我不敢再端详母亲了,我的双手紧紧地攥着母亲的手将它放在我的胸前,努力把我全身的热传递给母亲。

我这样端详母亲,大约在她70岁以后。年迈的母亲,由于过度劳累,腰越来越弯,个子越来越矮,矮得要抬着头吃力地和我说话,何况哮喘、胆结石、心脏病、风湿痛等等一身的慢性病常年折磨着她。和她年龄差不多的老姐妹一个个都仙去了,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母亲也会有这一天呀,这一天越来越近了,回避不得,阻拦不住。

我害怕母亲的那一天。于是我由以前一周回老家看她一次,变成两次。那时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上班的县城距老家26公里,冬天迎着风有时还顶着雪要骑两个多小时。不管天多黑、路多远、风多大,我也要赶回去看我的母亲,因为我害怕母亲的那一天。趁母亲还健在,我必须增加看望她的频率,

关于时间的短章

□曹军庆

这才是父子啊,针尖对麦芒。

多年来,我和父亲在内心里是有积怨的。他一定怪我没听他的,如果我听他的话,现在不会是这样子。

而我,尽管知道父亲是好心,但我反感他一见面就指责或叮嘱我。我们没能当面激烈地吵起来,是因为他住在乡下,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无论什么时候,父亲从没说过服过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不再说那些事了。

他可能依然对作家不屑,却也不再对我说话。我和父亲的深度和解是在什么时候达成的?我并不知道。内心里的和解,不再有一丝责备。

和解一定达成过,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或许我和父亲之间,一直都是彼此需要着的。

现在,就算父亲重提那些以前的设计,我也不会再反感。对,是这样,我反感什么呢?回忆父亲说过的那些话,他其实并不缺少智慧。

父亲的记性明显不如以前。下午刚打过麻将,母亲问他,同桌的三个人他却总也说不全。记不住啊,父亲说。

但是,父亲却记住了我的手机号码。他说,每天睡觉前,他都会像学生背书一样背我的手机

号码。他不明白手机号码为什么这么长。很难背的,他说。不知花了多少个夜晚,他终于背下了。

要不要我背给你听啊?父亲说。

要啊,你背。

父亲便背下来了,背我的手机号码。11个数字,

他中间停顿了两、四次,3个,再4个。

我只记住你一个人的手机号就行了,父亲满足地说。

那一刻,我哽咽无语。

棺材

人老了,是否就会迷恋死亡呢,或者仅仅限于言说?他们毫无忌讳地谈论自己的后事。而在老人们中间,他们还会彼此拿这种事开玩笑,以取笑对方。这种事是可以被谈笑的,尤其是在乡下。只有在乡下,死才可以成为一种哲学。那种哲学并不刻意,也不高深,它不是学理意义上的哲学,而是弥散在漫无尽头的日常生活中,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比如棺材,也叫寿材。乡间老人们很早就会为自己备下一副。如果条件许可,他们会尽可能地用上等木材,并让寿材的板壁更厚一些。

木材的品质和板壁的厚度,可以给它的主人争得应有的面子。那些做好的寿材,有的就这样

摆放着,呈现出木头的本色。有的则打上桐油刷上漆,那通常都是黑色。在那些古老的家庭里,只要有老人,多半会有这种物件。而乡下,那个时代,四十几岁即可称作老人了。我童年时,对随处可见的棺材既熟视无睹,又深怀恐惧。

我爷爷和我奶奶也都备下了棺材。我记得他们把两口棺材掳在一起搁置在厨房里,锅台,水缸,灶门,柴草。棺木就在厨房的角落里,大人们几乎从不提及它,大约只有孩子们才会偷偷地打量。我如果不得不在夜间去爷爷的厨房,盛饭或喝水,总会自个儿吓得心惊胆战,我害怕那里面突然间会有什么坐起来。这种对于恐惧的体验,盘踞在我的整个童年里。而且,走亲戚也好,去别人家串门也好,也总能不期而遇。

棺材在家里摆放的位置五花八门。我爷爷奶奶在厨房。有的人放在睡房,搁在墙边,或是码在床架下面。也有的干脆放在堂屋。前不久去恩施,和朋友在一位土家族老婆婆家里见到三口棺材。婆婆说,那是她和儿子、儿媳的,它们就放在正屋里。

家里放着棺材,就在棺材旁边生活。有些长寿的人,将和他们自己的棺材相伴几十年。还有人忍痛割爱,把他心爱的棺材借给某一个突然提前死去的人。

要到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样一种棺材现象(或称文化),其实是一种死亡哲学。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意识。纵然生活在土地里,那也都是些豁达的人,透彻的人。我明白,陪伴在他们身边的棺材,不是死亡的阴影,而是生命的归宿。

中午在食堂吃水饺的时候,突然又想起了父亲,想起他老人家晚年吃水饺的情形。

父亲是能吃的人,这可能与他的职业有关。一个把测绘、设计与施工集于一身的水利工程师,一年四季在野外工地上奔波,就像在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骆驼,总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这就锻炼出一个特别坚韧也是特别强大的“胃”。直到年愈古稀,父亲一顿还能吃60个水饺。大概是故意取一个吉利的数字吧,多一个也不吃。母亲一直不属于父亲的啰唆认真,常常蓦然往他碗里添上几个,或是趁他不注意拿掉几个,好像是故意要扰乱他的记数,也时常怀疑他是否数得精确。父亲却是从不多吃或少吃一个,比计算器算出的还要精确。

记得母亲捏的那种北方饺子很饱满,雪白的手擀面皮儿,肥瘦相间的猪肉肉心刺碎了伴着白萝卜和香菇、红葱,调料也是齐全适中,绝无一味过量出头,那味道确实是不能言说的鲜嫩而香美。每每看着父亲蘸着醋酱蒜泥和家乡特有的油泼辣子,聚精会神吃得津津有味,我就觉得好像自己享用到美食一样的幸福。于是在饭桌上静观父亲吃饭,就成了我们姐妹们的一个精彩保留节目。

我至今记得看父亲吃饺子的动人情形,老人家的惬意表情与胃口大开所透出的健康幸福的信息,那可真正是一种难得的亲情体验和精神层面的享受呀。

父亲的能吃,起初大概是与“聚粟田”这个名字有关。祖父当初给父亲起名为“聚田”,显然是有有用的,体现了一个祖祖辈辈的自耕农对于土地的热情和厚望。于是父亲的小名就成了一个动听的“田”字。就是这个被称作“田”的以后成为让我骄傲的父亲的人,他在年仅十多岁的时候,就固执地走出田园,告别故乡渭北高原而走进自己向往的生活。起初他似乎是坚决不接受祖父为他设计的人生道路——老老实实在田地上劳作,而是毅然决然地不务正业,顽强地选择了到外面的世界读书。父亲经过艰辛的努力,考取了西北地区的最高学府——西北农学院。那还是在旧中国,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大学生凤毛麟角,父亲的前途无可限量。但就在祖父改变初衷希望儿子从此飞黄腾达之时,一个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读书人却又心系乡土了,他决心为赶走困扰农民的酷暑而奉献毕生精力。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生性不凡的人,一个从小就懂得自己要什么和怎样去努力得到的人。

好在这时新中国的诞生,为父亲的理想添上了有力的翅膀。于是我的父亲只身来到了异常干旱的陕北山区,测设出第一条渠道,创造出第一亩水浇田,也就在陕北祖祖辈辈愁苦不堪的农民的脸上,滋润出一抹丰收的喜悦。而做着这一切时,父亲刚过而立之年,每顿饭能吃二斤四两干捞面,接着又可以一整天不吃一口饭。那时的野外工作,装备待遇和各种条件是异常简陋艰苦的。扛着笨重的仪器,每天往返步行百十里山路是经常的事情。父亲就这样,成了沙漠中的骆驼。父亲好吃硬面,最好是能咬出白茬子才过瘾,他的胃,可真是铁打钢铸一样的坚强啊。每天早晨出发前吃饱了饭的父亲,从来没有携带干粮的习惯。他的胃,就如同驼峰一样,成为贮备热能和维持艰难跋涉的动力仓库。父亲在人们的眼中,也就成为了吃了一顿饭饭足足能扛一两天的沙漠之舟。

我的家乡陕西渭北一带,历来有一种奇怪的习俗,就是东家雇用长工先不看别的,只看能吃不能吃。因此民间的“招聘考试”也就变得格外简单。现场大吃一顿,谁饭量大,谁就会被录用。应聘的人同掌柜的一同进餐,吃饭用的大号瓷碗称之为“博碗”。一般的人很少能返二碗,能一口气吃两博碗的,当然是大家抢着要用的冠军人物。父亲的饭量如果在那时候,是会很受欢迎的。可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困难时期,父亲可受了大罪。一个饭量大的人,又要把干粮省下给我们兄妹几个充饥,自己就拼命多喝些加了盐的开水,好把肚子哄住。于是父亲的手和脚很快就浮肿起来。到了后来,脚肿得连鞋子都穿不上了,只得整天赤着脚在工地上奔忙。

父亲并不是一个大块头的人,并非天生就是大饭量,而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奉献和牺牲精神,造就了他这艘沙漠之舟,是他所处的时代、生活和事业造就了他超长的担当、忍耐和博大。今天,像父亲这种大饭量的人已经很难见到,我的饭量连父亲的一半也不及。父亲特别爱吃水饺,他老人家直到晚年生病那天,还坐在饭桌前,面对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水饺。记忆中,父亲人生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握着筷子的右手再也抬不起来,很遗憾地张着眼睛,望着那一碗水饺发急。看得出,老人家当时是很难过的,他心中一定是说,一个连饺子也吃不动了的人,活着还有什么用呢?父亲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悉心回答的呀。

□忍诺元

父亲的饭量



倒影

空旷的天空,看得见的是白云,看不见的是清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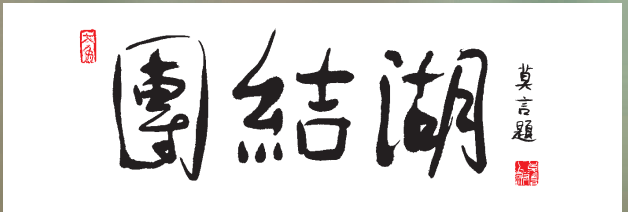
立秋的第一场雨打乱了这炎热纷扰的天气。地面显得格外潮湿,低洼处积攒的雨水,让路面上漾出一面面镜子,映出另一个世界。

一个人安静地看着。乌云化作雨滴之后,天空也渐渐明亮。光线摇摇晃晃地打量着孩童似懂不懂的年华,折射出另一个耀眼模样。有时候,不要把世界看得太孤单了。不管是水中的倒影还是黑暗处光线下的影子。至少孤单的时候还有倒影陪伴。水中的倒影,你做一个动作,它也跟着做。很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中探索,需要自问自答,并且给出肯定而自信的答复。

风来了,从远方传来了抒情的歌声,也揉皱了水中的倒影,影子变化出高低不同的线条。人生本来就是

一半忧伤,一半明媚。

Anja Buhre (德)/摄 彭懿文/文



关于牙的对话

□桑恒昌

朗读一千零一遍月光
娘守着电话睡着了
在梦中
接着瞭望

是谁在母亲的瞭望中之中
如同灯火瞭望群星
那灯火
暖暖的
照亮家乡和一盘土炕

外公,我的牙
怎么掉啦?

噢
你的牙太嫩了
怕它嚼不烂生活

外公,你的牙
怎么也掉啦?

哦
我的牙太老了
再也啃不动命运

瞭望的母亲

□刘福君

常常在家门口
母亲
向远方
向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瞭望

曾经左手叉腰
右手
在风中
而今双手在木拐上

继续瞭望——

清晨的阳光从山尖儿滑下
来了

正午的白云回家去了
直到白日依山尽了
蝴蝶把春天带来了
雪花把秋天带走了

当横河里的石蛙来到岸上